

中国现当代散文

袁勇麟◎主编

导读

(第三版)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教材

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教材

MOOC“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教材

中国现当代散文导读

(第三版)

袁勇麟◎主编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散文导读/袁勇麟主编. —3 版.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092-1181-6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散文-文学欣赏-中国-现代②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7386 号

中国现当代散文导读 (第三版)

袁勇麟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邮政编码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033692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 行 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总 编 室 (010) 68020336

盗版举报 (010) 68020336

邮 箱: xhr1224@aliyu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3 版

印 张: 19.75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4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主编简介

袁勇麟，1967年生，福建柘荣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协和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文化产业学会副会长等。曾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以及福建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双百计划”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主持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等。著有《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文学艺术产业》、《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十卷、《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第五卷等，主编《文化创意产业十五讲》、《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书系》、《新媒体传播学丛书》、《文学欣赏与创作》、《20世纪中国散文读本》等，著作曾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等。2010年负责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育）；2014年负责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主编的《文学欣赏与创作》和《文化创意产业十五讲》入选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一、现代散文发展概述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不过，中国古代散文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趋于成熟和完美；另一方面却也背上了许多包袱，形成框框套套，捆住了自己灵活的手脚。

散文需要变革，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指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外国散文的介绍，现代报刊的创办，为适应除旧布新的时代需要，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质变”，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散文产生和成长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广泛开展、各种新文学形式蓬勃兴起的五四时期，繁荣兴盛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拓展奋进，取得了“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光辉业绩。

（一）

中国现代散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尖锐批判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和近世文坛的拟古主义文风，钱玄同则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现代白话散文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在1917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最早具体论述散文变革的有关问题，并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文》一文中，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1923年6月发表的《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他还借用美国学者

的分法，把“纯散文”分为五类：一是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是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三是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是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是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胡梦华在1926年3月发表的《絮语散文》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欧美的Familiar Essay，称它是“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这些理论主张有破有立，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创立的新型散文有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

适应除旧布新、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议论性散文率先兴起。《新青年》创办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一些议论文思想新颖、激情充沛，可说是白话散文的一种最初形式。《新青年》1918年4月号首先开辟《随感录》专栏，专登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这些具有文学意味的杂感短评便是后来统称为“杂文”一类作品的先导。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报刊也竞相开辟杂文栏目，共同促进现代杂文的蓬勃发展。在各式各样的杂文作品中，杂文家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且倾注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探求民族解放之路的革命激情和理想愿望，同时还注重提高论辩说理的艺术性，努力形成各人的独特风格，使杂文有别于一般的论说文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鲁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和最杰出的代表。此外，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陈西滢等人也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建和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

记叙抒情的白话散文几乎与杂感短评同时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早在1918年间《新青年》杂志上开始出现白话文学作品时，就有胡适等人的记叙散文和刘半农的语体散文诗试作陆续发表。只是杂感短评因其更便于从事除旧布新的工作而率先盛行开来，记叙抒情散文这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了新文学运动由致力于“破旧”向致力于“立新”深入发展的阶段，记叙抒情散文的各种样式才快步赶上杂文的发展势头。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

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和《归航》、孙伏园的《伏园游记》、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充满异国情调；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各具地方色彩；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名胜，尽情讴歌自然美，都开拓了游记、通讯的新题材新境界。此外，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倪貽德的《东海之滨》、陈学昭的《倦旅》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这时，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新与旧、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冲突相当尖锐。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地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作家出自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内在需要，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抒情文体。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抒情小品从《晨报副刊》的《浪漫谈》专栏上起步，到《小说月报》的《创作》专栏内的名篇迭出，表明它业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冰心的《笑》和《往事》、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王统照创作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冥想小品，徐志摩在抒情散文中自剖心态，叶圣陶随时随地抒写日常感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等人的随笔散文夹叙夹议……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总体上说，自五四开始，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记叙抒情散文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白话美文的出现，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语），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因此，五四时期散文艺术的蜕旧变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散文出现过短暂的沉寂期。随着政治风云的突变和革命形势的周折，新文学阵营也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大屠杀所吓倒，开始动摇后退了；一部分文人则存心与当局采取同一步调；有些人处于苦闷与探索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一批从政治漩涡中撤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则继续坚定地探索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作家的生活态度、思想立场、心理状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当时和后来的散文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20世纪20年代末“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鲁迅语）白色恐怖时期，新兴散文原先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阻遏，但正如政治高压遏制不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现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也是扼杀不了的，它在逆境中仍曲折生长，“仗着挣扎和战斗”（鲁迅语）走向新的繁荣。这时，因为形势严峻，杂感短评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如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严霜下的梦》等，以个人抒怀方式和象征性意象表现革命低潮时期的精神苦闷，成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象征；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在《骆驼草》上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的方向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如阿英的《流离》、郑振铎的《海燕》、郁达夫的《灯蛾埋葬之夜》和《感伤的行旅》等。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各种散文全面复苏，



新体散文萌生发展，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邀请鲁迅、茅盾等人为之撰稿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申报·自由谈》继承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等传统，注重发表杂文、随笔、速写、抒情散文，汇集了许多散文作家。影响所及，许多大报副刊纷纷仿效，《中华日报》由聂绀弩主编《动向》副刊，《立报》由谢六逸主编《言林》副刊，《大公报》由沈从文、萧乾编辑《文艺》副刊，都为散文广开门路。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涛声》、《新语林》、《芒种》、《太白》、《水星》、《杂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文艺风景》、《天地人》、《中流》、《光明》，等等。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各书店也竞相出版散文的专集、选集以至于丛书，如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丛刊》，收入散文集甚多，靳以为良友主编一套《现代散文新集》。报刊杂志上散文园地的扩大，出版商热心出版散文著作，这些都说明一个散文创作高潮业已形成，写作和阅读散文蔚成一时风气。尤其可喜的是，这时期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巴金、靳以、柯灵、唐弢、徐懋庸、周木斋、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丽尼、陆蠡、萧红、萧军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在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与《骆驼草》的作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刘半农等，和《金屋月刊》的作者邵洵美、章克标等，以及一些气味相投的同好如沈启无、徐訏、陶亢德等，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1934年4月），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1935年9月），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径路，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

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人。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1931年8月）、《新语林》（1934年7月）、《太白》（1934年9月）、《芒种》（1935年3月）、《中流》（1936年9月）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冰心、叶圣陶、丰子恺、郁达夫、沈从文、李健吾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他们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于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还有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轻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萧乾、吴伯箫、芦焚、朱企霞、方敬、陈敬容、严文井、南星、季羨林等，他们以《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和《水星》为阵地，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这两类作品里。前者吸收了小说“比较客观、刻画完整”的长处，融化短篇小说的某些观照方式和表现手法，使记叙性散文带有小说化倾向，这在李广田的《银狐集》、方敬的《风尘集》、陆蠡的《竹刀》、丽尼的《白夜》中可见一斑；后者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在散文创作中倾注了诗艺，丰富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的能力，如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黄昏之献》和《鹰之歌》、李广田的《画廊集》和《雀蓑记》、缪崇群的《寄健康人》、陆蠡的《海星》等。

东北沦陷后，一批原来在东北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作家陆续逃亡到关内，加上流亡学生中崛起的一批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李辉英、白朗、罗烽等。他们最先尝到失土流离的惨痛，因而最先喊出抗日救亡的呼声。“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铭心的思

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总之，现代散文从发轫启程到阔步迈进，从播种萌发进入全面丰收，第二个十年的散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一时期散文繁荣的局面，一方面是动荡剧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现代散文深入生活、不断开拓艺术视野的结果。而散文期刊的空前兴盛，也起了促进作用。它们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壮举的序幕。从此，漫天烽火，遍地硝烟，中国社会进入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状态。由于战争进程的起伏变迁，也由于这时期客观上形成了不同政治区域（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并存交错和文化据点散布各地的特殊格局，作家的创作也就因时因此而异，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散文四处开花、多样共荣、迁流曼衍、此起彼伏的发展风貌。

抗战初期民族激情鼎沸，战斗热情高昂。为适应战时总动员和反映战争现实的需要，各种散文样式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通讯报告特别发达，拥有最广大的作者和读者，“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以群语）。从1937年8月起就有《卢沟桥之战》等专集问世，并诞生了一批从实地战斗生活磨炼中产生出来的优秀产品，如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丘东平的《第七连》、碧野的《北方的原野》、曹白的《呼吸》等。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报告文学在国统区被压制下去，却在解放区新天地中得以蓬勃发展。在抗战初期，杂文既是抨击敌伪的锐利武器，又是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战斗号角。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靳以等就充分发挥这一文体的特长，为抗战呐喊助威。因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局面业已形成，这时的杂文普遍带有热情洋溢、议论风发、明快畅达的新特点。记叙抒情散文的样式也在烽火硝烟、群情激昂的年代改变着自己的色调。血泪的控诉、救亡的呼喊、战斗的豪情、胜利的信念、不屈的斗志，充满字里行间，真是慷慨悲歌，刚健爽朗。因此，葛琴认为：“抗战以后，我们的散文中间又散发出新生的健康的生命气息了。”

抗战初期散文所呈现的阳刚美共趋流向，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各政治区域社会现实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艺术需要所改变，随后出现的是受地区

性现实制约的丰富多样、广泛拓展的新风貌。这种状况持续存在于整个 40 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孤岛”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散文创作。

从 1937 年 11 月上海失守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年零一个月，史称上海“孤岛”时期。留居上海“孤岛”的作家有王任叔、郑振铎、王统照、阿英、夏丏尊、李健吾、芦焚、柯灵、唐弢、周木斋、孔另境、陆蠡、列车等。他们在日伪横行的险恶环境里，坚守文化岗位，巧妙地利用洋商招牌创办了一些可以发表自己作品的报刊杂志。柯灵先后主编过《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和《正言报·草原》，王任叔主编过《译报·大家谈》和《申报·自由谈》，周木斋主编过《导报·早茶》，这几种报纸副刊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和通讯报告。注重发表散文作品的文学期刊有《鲁迅风》、《杂文丛刊》、《野火》、《文艺》、《文艺新潮》和《宇宙风乙刊》等。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等人承传“鲁迅风”杂文传统，王统照的《去来兮》和《繁辞集》、柯灵的《晦明》、唐弢的《落帆集》、芦焚的《上海手札》、陆蠡的《囚绿记》等，代表了“孤岛”时期散文和小品的成就；朱作同、梅益、林淡秋等发起写作报告文学总集《上海一日》。仇重（唐弢）在 1940 年末回顾当年散文创作时指出：在黑暗笼罩下的上海“孤岛”，“作为破坏旧生活的有战斗的杂文，作为激发自尊心的有抒情的散文”，简单地概括了“孤岛”时期杂文和散文创作的主导倾向。

国统区各地散文创作是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形成自己的新特点的。这时，战争形势严峻，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国人热情积淀升华，散文艺术也在反思、扬弃中走向新的成熟。40 年代国统区散文克服抗战初期普遍存在的题材集中、热情浮泛、率直显露、风格较单一的局限，恢复和发展战前散文个性化、多样化的艺术传统，并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突进。

杂文在国统区一直保持兴盛不衰的发展势头。1940 年 8 月在桂林创刊的《野草》月刊，以聂绀弩、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为骨干，后来转至香港，坚持到 1949 年，是这一时期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杂文刊物。重庆作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杂文创作也相当活跃，郭沫若、冯雪峰、田仲济、廖沫沙、孔罗荪、靳以等人在《新华日报》副刊等阵地上发表杂文，他们的创作与上海“孤岛”的《鲁迅风》和桂林的《野草》有着共同的战斗倾向。抗战时期，一大批知名学者如闻一多、朱自清、吴晗、

王力等都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创作了大量有着鲜明艺术色彩的杂文，这是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的新气象。朱自清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杂文的战斗实绩，认为它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40年代国统区杂文与上海“孤岛”时期杂文的交替展开，说明了现代杂文并未因鲁迅的过世而消褪其战斗威力和发展势头，也说明了现代杂文有一脉相承的现实战斗精神。

报告文学在40年代国统区基本上被压制下去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同样纪实功能的生活速写、旅途通讯、见闻杂记一类的记叙散文。它们承续二三十年代同类作品所形成的正视现实、面向社会、批判写实、干预生活的传统，随着作家见闻经历的丰富而拓宽发展道路。战乱流离生活、内地闭塞状况、后方社会弊端、底层人民苦难、战后萧索景象等，都在记叙散文中得到广泛而如实的反映。茅盾的《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以其擅长的批判性写实手法揭露西南、西北大后方社会的畸形生活；巴金的《旅途通讯》和《旅途杂记》，以其一贯的热情笔触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丰子恺的“避难五记”（《辞缘缘堂》、《桐庐负暄》、《萍乡闻耗》、《汉口庆捷》和《桂林讲学》），染上了战争硝烟和仆仆风尘，国恨家仇融为一体；靳以的《人世百图》，让形象本身说话，进行广泛的心理活动描述，创造了散文勾描世间相的一种新写法；缪崇群的《人间百相》则是对人物素描的一个贡献，他以素描方式勾勒了世间人相的真实面貌，以鲜明的个性特征概括了同类型人物的本质特征；冯至的《山水》，从大自然中“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如此等等，都各有新的拓展、新的收获，整体上显示着作家的视野开阔了，与现实和底层人民的关系更密切了，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旧世界的色调也普遍增强了。

人们普遍认为，抗战以来抒情性散文小品产量不丰、成就有限，甚至走向衰落了。实际上，在上海“孤岛”时期与战后时期，在40年代西南大后方和东南内地，以及在华北沦陷区，都有过活跃发达的史实和大量可读的作品。可以说，40年代国统区的抒情散文与上海“孤岛”时期同类作品相互映照，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散文小品的发展主流。重庆的《国民公报·文群》、《大公报·战线》和《中央日报·平明》，桂林的《救亡日报·文化岗位》，《大公报·文艺》、《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和《人世间》，昆明的《文聚》和《诗与散文》，永安的《现代文艺》，南平的《东南日报·笔垒》，等等，都是战时散文小品的重要园地。在一大批知名作家的带动下，散文小品创作出现新人蜂起、四面开花的景观。就艺术内容而言，这

时期国统区的散文小品主要以各个作家抒怀述感的真挚性和独特性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作家的抒情自我形象因人而异，但大多可以归并入“在暗夜里呼唤光明者”或“在黑暗中战取光明者”的形象系列。从巴金、靳以、缪崇群、李广田，到新起的田一文、刘北汜、陈敬容、莫洛、郭风等，都有声息相通之处。从表现形式上说，大多是抒情小品、散文诗一类短小凝练之作，又大多采用比喻、象征、暗示、寓意等间接抒情手法，写得曲折含蓄。通常出现的意象有曙前、冬夜、寒风、冰雪、星光、烛火、黎明、春天之类与黑暗和光明、现实和理想、今天与明天等矛盾冲突对应的景物和时序，从而曲折透露自己的心曲，隐约把握到了新旧社会处于生死决战关头的时代脉搏。这就在整体上显示了40年代国统区抒情散文的美学风貌，既不同于20年代觉醒者那种“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气氛，也不同于30年代那批青年作家的忧伤和迷惘，还不同于抗战初期战地抒情之作的慷慨悲壮，倒是接近于上海“孤岛”时期那种“炼狱中的火花”，犹如“曙前”的“星光”，给人一种温柔幽美而又沉着坚韧的审美感受，启迪人们坚定地度过黑夜，去迎接黎明的到来。

与上海“孤岛”和国统区散文交汇构成战时散文发展主流而又具有独特风貌的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运动”所产生的新型散文。解放区散文是以努力“写出新生活的内容和外观”（孙犁语）而开拓现代散文发展新路的，报告文学获得了重大发展，杂文形成新的特质，记叙抒情散文改变了格调，散文的语言风格也往大众化和民族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解放区新的现实生活、新的战斗业绩和新的人物风貌，为报告文学的成长提供了丰厚土壤。边区的生产建设，敌后的艰难斗争，军民的鱼水关系，干群的新型关系，人民英雄的卓著功绩，劳动模范的动人事迹，解放大军的挺进雄姿，历史巨变的壮丽画面，无一不在解放区报告文学中得到及时广泛、具体生动的反映。作为抗日根据地报告文学的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丁玲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田保霖》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周立波不仅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为现代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好范例”，而且也写下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优秀作品；何其芳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后，从“画梦”到“写实”，从空虚的想象到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为他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他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收在《星火集》及其续编中；沙汀记述贺龙将军在抗战初期的战地生活和回忆的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是抗战以来描写高级将领的报告文学中最出色的一部；周而复的两篇报告文

学《海上的遭遇》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获得了很大的声誉；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揭露了汉奸汪精卫的丑恶嘴脸；等等。在我国报告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

解放区杂文面临着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如何发展的崭新问题，经过争论和探索，逐步走出了自己的新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面发挥杂文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社会功能，成为解放区杂文作家的基本认识和努力方向。谢觉哉以“焕南”为笔名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炉边闲话》、《一得书》、《案头杂记》等歌颂新生活、漫谈思想修养的新型杂文；林默涵的杂文集《狮和龙》，有着一一种简捷隽永、清丽朗畅的艺术风格，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解放区杂文大多写得明快朴素、深入浅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杂文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记叙抒情散文各样式在解放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记叙性散文较发达，“纯”抒情散文偶有所作，大多数作品是一种以叙事为主而兼有抒情因素、将记实与述感融为一体的散文速写。许多作家在热情歌颂新生活、新人物的同时，即兴抒写自己由新现实所激发出来的新感受和新激情，以及在新天地中脱胎换骨的精神蜕变。丁玲在《陕北风光》的《校后记所感》中指出：“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和痛苦，我才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过许多愉快。”丁玲的这种感情经历和心得是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所共有的，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何其芳、吴伯箫、陈学昭、严文井等人也曾在散文中表达了这种经过自我战斗的痛苦而抵达新生的快乐的情感变迁。在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新作家如孙犁、萧也牧等人的散文速写，则以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追求客体“真象”与主体“真情”统一而显示自己的特色。解放区的散文速写洋溢着清新芬芳的泥土气息和朗阔高昂的革命激情，与国统区散文的色调自然有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不过，毋庸讳言，这只是一个新开端而已，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稚气，而且又是付出了一定的艺术代价的。如何其芳，到了延安后，面对新生活，需要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他基本抛弃了抒情散文的艺术形式及其早期积累的艺术经验，转向写作杂文和报告文学这两种他较生疏的文学形式，多少限制了自己的手脚，抑制了自己艺术个性的发展。他的杂文过于直露，明晰有余，含蕴不足，缺乏鲁迅杂文那种诗与政论结合的艺术光

彩。他的报告文学似有堆砌素材、平铺直叙之嫌。倒是那几篇自我解剖、抒写自己的作品,如《一个平常的故事》、《饥饿》和《论快乐》,写得情文并茂。他的作品以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为艺术内容,又是面对新的读者,当然需要新创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通俗朴素便是他这时追求的目标。因而,他几乎放弃早期经常使用的比喻、象征、暗示的表现技巧,改用白描直叙;不用繁富绮丽的长句,而接近于平淡明白的口语。他想描摹出生活本身的天然美,但由于深入生活不够,对新的文学形式又不熟练,他感到自己笔下的无力和苍白,苦恼于艺术上的退步。

总的说来,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争动乱状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迁,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散文的触角无处不及,散文的功能多向发挥,散文的园圃五光十色,它以自己的时代旋律谱写了中国现代散文进行曲中高昂的第三乐章!

二、当代散文发展概述

当代中国大陆散文发展以1976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76年的27年间,散文创作经历了所谓“复兴”、“丰收”和“空白”几个时期,由于当时思想文化封闭,个性意识丧失,散文从内容到形式大都过于循规蹈矩,日趋模式化。而且由于“工具论”、“武器论”、“骑兵说”、“形散神不散”等框框套套的束缚,导致散文严重异化。因此,曾经在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被鲁迅认为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散文小品,此时已失去往日的风采,再也没有出现朱自清当年所描绘的现代散文的繁荣景象:“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这种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的散文创作局面,只有在新时期的文坛中才又重现,甚至有了新的突破。许多散文家不仅走出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三家模式”的局限,而且也不满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他们主张要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琳琅满目的新文体、新形式来”。

(一)

共和国初期的散文,是在继承“延安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要求文学具有“颂歌”的基调。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的中文译文，斯大林直截了当地给作家、艺术家规定的任务是充当“先进阶级的歌手”。散文因为短小灵活，在配合政治任务、表现新人新事、讴歌英雄模范方面，更是发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汪曾祺在《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指出，50年代的散文，“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而且，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通讯、报告、特写的格局，纪实性散文多，狭义的抒情散文或曰美文、艺术散文少。于是，最被认可的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通讯报告的色彩，50年代初最著名的散文就是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从上甘岭来》、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曹禺的《半日的“旅行”》、杨朔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都是以客观的纪实或叙事为主。当时权威的散文选本也大都冠以“散文特写”的名称，以至于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选编新中国成立30年来散文作品选时，还是取名《1949—1979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们在评价5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时，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家“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并且过于将散文混同于一般的通讯报告，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味”。其实这只是看到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下的散文创作情况，而在文坛边缘，一些曾经有过“不光彩历史”的人如“汉奸文人”周作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等人的“民间创作”，却长期以来为文学史所忽视。这不仅仅是一种“疏漏”，更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知识话语的霸权中所形成的散文观对“民间散文”的漠视。周作人从1949年11月22日开始至1952年3月15日止，以申寿等笔名在上海的小报《亦报》副刊《隔日谈》和《饭后随笔》栏中，发表了908篇随笔小品，另外从1950年1月10日至3月27日，还在另一份小报《大报》上发表了43篇随笔小品。其中除一部分是回忆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曾结集为《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外，其余大部分文章当时均未结集出版。由于《亦报》、《大报》在文艺界、学术界影响不大，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直到1988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书，才使这些散文重见天日。